

中国百科年鉴

1985



1985

中国百科年鉴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总社: 北京安定门外外馆东街甲1号 分社: 上海古北路65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装

上海市印刷一厂彩图分色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2.5 插页 8 字数 1,660,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7197·1025 精装(乙)国内定价: 9.90元

F
92.5
146
100

中国百科年鉴

1985

ZHONGGUO BAIKE NIANJIAN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胡乔木

副主任 (按姓氏笔画顺序)

于光远	贝时璋	卢嘉锡	<u>华罗庚</u>	刘瑞龙	严济慈
吴阶平	沈 鸿	宋时轮	张友渔	陈翰伯	陈翰笙
茅以升	周 扬	周培源	姜椿芳	夏征农	钱学森
裴丽生					

委 员 (按姓氏笔画顺序)

NJ90/45/0

丁光训	于光远	马大猷	王 力	<u>王竹溪</u>	王绶琯
王朝闻	牙含章	贝时璋	艾中信	叶笃正	卢嘉锡
包尔汉	冯 至	司徒慧敏	吕 骥	吕叔湘	朱洪元
朱德熙	任新民	<u>华罗庚</u>	刘开渠	<u>刘思慕</u>	刘瑞龙
许振英	许涤新	孙俊人	孙毓棠	<u>杨石先</u>	杨宪益
苏步青	李 珩	李国豪	李春芬	严济慈	肖 克
吴于廑	吴中伦	吴文俊	吴阶平	吴作人	<u>吴学周</u>
吴晓邦	邹家骅	沈 元	沈 鸿	宋 健	宋时轮
张 庚	张 震	张友渔	张含英	张钰哲	陆 达
陈世骧	陈永龄	<u>陈维稷</u>	陈虞孙	陈翰伯	陈翰笙
林 超	茅以升	罗竹风	季 龙	季羨林	周 扬
周有光	周培源	孟昭英	柳大纲	胡 绳	胡乔木
胡愈之	荣高棠	赵朴初	侯外庐	侯祥麟	段学复
俞大维	宦 乡	姜椿芳	费孝通	贺绿汀	夏 衍
<u>夏 鼐</u>	夏征农	钱令希	钱伟长	钱学森	钱临照
<u>钱俊瑞</u>	倪海曙	殷宏章	翁独健	唐长孺	唐振绪
陶 钝	黄秉维	曹 禺	董纯才	程裕淇	傅承义
曾世英	曾呈奎	谢希德	裴丽生	潘 菽	潘念之

编辑说明

一、《中国百科年鉴》是属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系列的。它在1980年创刊时,在“前言”中说过:“《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各卷须经十年之久方能出齐,从第一版到第二版还要间隔一段时间……为此,我们陆续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各卷的同时,每年编辑出版《中国百科年鉴》。”这就是说,“年鉴”出版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已经出版的“全书”各卷补充未及收录的资料;另一方面是为尚未出版的“全书”各卷提供资料。提供资料是“年鉴”的首要任务,它以“条目”为基本形式,分门别类地记录上一年度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和这个星球(包括外层空间)所发生的每一个重大社会事件和自然现象,以及我们对之进行研究、探索,使其造福人类的种种活动。“条目”的开头用黑体字加【】符号作标题,提示“条目”的中心内容。

二、“年鉴”是工具书,它之所以受到欢迎在于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从每年出版的年鉴中,检索到他所需要了解的新知识,或者随手翻阅也可以从中发现尚未了解的新知识。因此从本年度起,我们本着一切为了方便读者的宗旨,对“年鉴”的编排,试作如下的调整和改革:①为便于读者检

索或翻阅,除进一步把“目次”和“索引”办好外,对各部类的分目(如科学技术部类的天文学、地学、生物学),有意识地增添一些提要,借以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②将各部类的部首标志改作“书眉”。③在编排顺序上将“各国概况”、“国际会议”移至尾部。④增设“新闻人物”栏目,除将原“时代楷模”移入外,力求范围更广些,将新近出现的受到注意的人物尽量收入。

三、年鉴发表的署名文章有两种,一是“专文”,着重论述一个领域的形势,一是“特稿”,着重介绍一个事物的情况。

四、条目或文章的撰稿人都是国家各管理机关和专业研究机关的工作人员。所用资料和数据都经过审核,做到准确可靠。

五、“各省、市、自治区概况”,按国务院规定次序排列。

六、“各国概况”的国家和地区的名称,除汉译外,一律附加英文名,排列先后按汉语拼音字母为序。每个国家都配有地理位置示意图。

七、年鉴截稿时间一般以上一年度12月31日为界。但对当年特别重大的事件,则作为“特载”收录,列在卷首。

八、台湾省有关数据收在“各省、市、自治区概况”内的“台湾省”中,其他部类的综合数据一般不包括台湾省。

九、为读者所关心的有关香港情况,本年鉴今后将以较大篇幅予以报道。

中国百科年鉴

编辑部主要人员

主 编 刘火子

副主编 范春林

编 委 (按姓氏笔画顺序) 丁一琛

毛君国 朱效荣 施伟达

特邀编委 翁泽永

责任编辑 (按姓氏笔画顺序) 石蔚春

刘树辰 陈迎盛 陈贤德

林德珍 曹 萍 翟志荣

葛永庆

图片编辑 郁庆云

装帧设计 张苏予

责任校对 孟永宸

编辑部地址 上海古北路650号

电话 597500(总机)

电报挂号 0198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于1985年9月18~23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章的有关规定决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规定，这次全国代表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并通过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

出席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共992名。他们是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名额分配和产生办法的通知》产生的。其中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343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61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27人，不是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35人，另有326名是根据中央的要求推选出来的各条战线的党员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会议。

在9月18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胡耀邦致开幕词，赵紫阳在会上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作了说明。

从9月18日下午起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和赵紫阳的说明，讨论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的局部调整问题。在几天的分组会议的讨论中，代表们认为，为了使党的领导机构保持旺盛的活力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已经成为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大家高度评价了请求退出中央三个委员会的老同志们的高尚风格。

代表们在分组会上酝酿增选中央三个委员会的成员时认为，这次人事调整工作，符合在革命化的前提下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的要求，坚持和发扬了任人唯贤的优良传统。大家表示赞成中央提出的增选三个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名单。

9月22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会上宣读了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提请全国代表会议审议的报告》。代表们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再次向这些老同志表示深切的敬意，并一致赞同四中全会的这个报告，同意64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6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31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退出中纪委的同志中包括新任冶金工业部部长戚元靖，他是根据减少交叉任职的精神而提出不再担任中纪委委员的。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增选了中央委员会委员56人，候补委员35人；增选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56人；增选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1人。这次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有64人，他们中有中央委员29人，中央候补委员35人。另有27位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被增选为中央委员。这些同志文化程度较高，大多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被陆续任命担任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军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重要领导职务的年富力强的干部。

经过这次局部调整后，中央委员会成员为343人，其中中央委员为210人，中央候补委员为133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为18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为129人。

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举行闭幕会议。邓小平、陈云在会上讲了话，李先念致闭幕词。在邓小平、陈云讲话和李先念致闭幕词过程中，代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会议闭幕时，全场起立，高唱《国际歌》。

会议结束后，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同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部分老同志以及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公报

1985年9月16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1985年9月16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88人，候补中央委员129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30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21人，不是上述三个委员会成员的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40人。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

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同志主持。叶剑英同志因病未出席会议。

全会决定，今年9月18日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决定将这个文件提请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审议。

全会讨论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全会收到了一批老同志分别请求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信。全会高度评价这些老同志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积极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表率行动,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并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

全会给叶剑英同志和黄克诚同志写了致敬信,在他们由于健康原因请求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时候,以全会的名义表达全党同志对他们的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

全体会议之前,开了4天预备会议,就上述议题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认真的讨论。

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是一次团结的会议,成功的会议。

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公报

1985年9月24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985年9月24日于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202人,中央候补委员128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27人。经过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老同志也列席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

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并按照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这次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的、中央政治局反复酝酿的候选人名单,进行充分的认真的讨论,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进行了局部的调整。

全会增选了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由22位同志组成。他们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万里、习仲勋、方毅、田纪云、乔石、李鹏、杨尚昆、杨得志、吴学谦、余秋里、胡乔木、胡启立、姚依林、倪志福、彭真;政治局候补

委员秦基伟、陈慕华。

全会根据习仲勋、谷牧、姚依林同志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增选了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由11位同志组成。他们是:总书记胡耀邦,书记胡启立、万里、余秋里、乔石、田纪云、李鹏、陈丕显、邓力群、郝建秀、王兆国。

全会认为,经过部分调整 and 增选后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将更富有朝气和活力,对于确保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当前我国大好的政治、经济形势,更加有力地推进我国的全面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次全会还批准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增选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副主任人选;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增选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书记、常务书记、书记人选。

这次全会在充满团结民主的气氛中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提请全国代表会议审议的报告

十二届四中全会,收到了一批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信。全会同意这些同志的请求,现提请全国代表会议审议。

党的十二大开始了党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和合作。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为了使党的事业保持旺盛的活力,适应愈来愈繁重的工作的要求,加快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年轻化的进程,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全会认为,按照党章关于干部队伍“四化”的要求和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能终身任职的规定,同意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的成员,在即

将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一批比较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同时增选一批新的成员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适时的和必要的。

我们党是一个有60多年历史的大党。党内有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十二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里,就聚集了他们中的一些优秀代表。这些老同志在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时期里,在近几年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集体奋斗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现在,一部分年高体弱的老同志,要求

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的成员，以便一批比较年轻的同志能够增选进来。他们这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模范行动，必将激励全党同志更好地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斗。

全会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政治上充分尊重退下来的老同志，并根据自愿原则和各人的健康状况，从各方面为他们继续关心党和人民的事业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按照有关规定保证他们原有的生活待遇。对离职休养的老同志，尤其要多加关心和照顾，让他们愉快地安度晚年，健康长寿。

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64位同志是：

叶剑英	邓颖超	徐向前	聂荣臻	乌兰夫	王震
韦国清	李德生	宋任穷	张廷发	于桑	马文瑞
王谦	王六生	王金山	王思茂	王鹤寿	白栋材
朱穆之	任仲夷	刘震	刘华清	刘志坚	刘明辉
刘复之	许家屯	孙大光	孙国治	李锐	李化民
李启明	杨易辰	肖全夫	汪东兴	张震	张爱萍
张钰秀	陈伟达	陈国栋	林乎加	周子健	郑三生
赵守一	赵苍壁	胡立教	洪学智	袁宝华	钱学森

钱瑛	高厚良	黄华	黄新廷	康克清	梁必业
梁灵光	蒋南翔	韩先楚	章应机	普大东	谢振华
廖汉生	谭友林	谭启龙	谭善和		

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的36位同志是：

李井泉	肖劲光	何长工	傅钟	万毅	王必成
王尚荣	区梦觉	方志纯	帅孟奇	冯铨	刘晓
李达	李贞	李卓然	李楚离	杨尚奎	杨献珍
张苏	张令彬	张启龙	张维桢	范式人	林铁
周扬	周里	奎璧	钟汉华	钟期光	袁任远
夏衍	钱之光	郭化若	黄欧东	唐才芳	魏文伯

不再担任中纪委委员的31位同志是：

黄克诚	王从吾	李昌	马国瑞	蔡顺礼	王凌
王尧山	王鹤峰	毛铎	朱绍清	刘英	刘汉生
严克伦	李耀	吴信泉	张海峰	陈坦	林一心
金昭典	段云	饶正锡	徐深吉	郭建	唐廷杰
黄民伟	曹广化	曹幼民	彭儒	谭申平	蹇先任
戚元靖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1985年9月16日

团结奋斗 再展宏图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

1985年9月18日

胡耀邦

同志们：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现在开幕了。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包括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343 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61 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27 人，以及不是上述三个委员会成员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军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 35 人，各条战线的党员代表 326 人，总共 992 人。今天实到代表 933 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年，我们党中央的政治生活，是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的，是很正常的。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都是靠了老一辈革命家掌舵，同时经过反复酝酿，广泛征求意见，有的问题还征询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意见，然后按照党章规定的制度，如期召开中央的会议，包括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集体作出决定。这样做，就使得我们能够集中大家的经验和智慧，在重大问题的方针、政策上，考虑得比较周到，认识比较一致，整个工作的步骤和节拍大家比较了解，因而避免了大的失误。这是一条重要经验。我们这几年工作之所以能够进展得比较顺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发展得比较快，同这一条是分不开的。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章的有关规定，决定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种制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过。七大修改的党

章，规定中央可以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解决重大问题，并且补选中央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八大修改的党章，规定实行代表常任制，所以无需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十二大修改的党章，没有规定实行代表常任制，而是规定每 5 年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两次代表大会之间会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及时解决，所以又规定了必要时可以召开代表会议。十二届三中全会，考虑到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而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关系到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要作相当幅度的调整，尤其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发扬党内民主，庄重从事，所以决定要开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十二届四中全会审查了全部准备工作情况，决定这个会议从今天起开始举行。

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酝酿准备已经很久了。起草工作是由紫阳同志主持的。政治局、书记处讨论过多次。其间在 7 月份，还曾经召集有各部门、各地方、若干大厂矿负责人和一些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共约 200 人参加的会议，征求意见。现在经四中全会原则通过，提请代表会议审议。这个建议，主要是解决“七五”期间经济工作的方针方向问题，紫阳同志还要就这个建议作说明。代表会议通过之后，国务院将根据建议，制定“七五”计划，提请明年春季举行的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央全会认

为,这个建议提出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目标和任务是积极的稳妥的。我相信,它对于正确制定“七五”计划,继续理顺经济关系,保证今后5年乃至更长一些时间内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一定会起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于组织事项,中央从今年5月份起就根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设立了由胡耀邦、习仲勋、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乔石、王鹤寿同志组成的工作小组,指导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细致周密的酝酿、考核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工作,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决议,关于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的报告和给叶剑英、黄克诚同志的致敬信,并且提出了中央三个委员会增选新成员的候选人名单。这些也都经过政治局、书记处多次讨论,然后提交十二届四中全会。全会讨论通过了上述决议、报告和两封致敬信,并对候选人名单作了充分的酝酿。现在提请代表会议审议和选举。

这两三年来,好多老同志陆续请求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现在一批老同志退出来,他们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中央领导干部退休制度,推进中央领导成员年轻化这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当中,起了模范作用,对党作了新的贡献。老同志当中,大部分退下来,是党的事业的需要,小部分留下来,也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我们党是领导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大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产生了一批经验十分丰富,在党内外国内外具有崇高威望的老革命家。这些老革命家,有几位健康情况还相当好。把这几位老革命家留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继续发挥决策作用,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此外,还有些同志,虽然也已年高,但是党仍然需要他们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主管某项全国性工作,把他们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也是必要的。

按照十二届四中全会讨论过的候选人名单,这次会议要增选中央委员会委员56人,候补委员34人。在增选的中央委员当中,一部分是原来的候补委员,另一部分是近几年涌现出来的、经过一定考验的、比较优秀的同志。同时还要增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5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3人。请大家对名单进行认

真讨论,充分发表意见,然后进行选举。

领导班子在德才兼备的基础上年轻化的问题,中央在1979年就提出来了。在那以后,从上到下经过了两次比较大的调整。一次是从1982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到同年9月十二大;一次是从今年年初到这次会议。经过两次调整,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以至军级、师级的领导班子,按照在德才兼备的基础上年轻化的要求进行调整的工作,即将告一段落。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又将前进一大步。而这次会议之后的五中全会,还将使政治局、书记处的成员也年轻化一些。总的来看,从1982年算起,不到4年,我们各级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应当说,这项工作的进展是比较顺利的。这对于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同志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将近7年了。这7年,是建国以来经济、政治形势发展的最好的时期之一。我们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略任务。十二大以来这3年,总的说来,全党工作是做得好的,成效是显著的。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国民经济的增长超出预料,相应地人民生活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势头很好。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基本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也有好转的方面,虽然问题还多,特别是在新情况、新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还很多,但是只要真正抓紧,真正把工作做好,这些问题是完全能够解决的。会议结束的时候,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还要就一些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因此我这里就不多讲了。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我有这么一个感觉,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任务,集中到一点,就是:团结奋斗,再展宏图。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这次会议对于更好地完成十二大提出的任务,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一定能够起重大的历史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85年9月23日

邓小平

同志们: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开得很好,圆满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现在,我讲4点意见。

第一点,关于形势和改革。大家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7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

性的时期之一。这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

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改革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经提出来了。改革从农村开始，一度议论纷纷。经过3年，解决了许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取得成效，认识也就比较一致了。当然也还有新问题，还需要继续解决。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总的说来，除了个别例外，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同时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刚刚起步，总的方向、原则有了，具体章法还要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我们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大胆探索，同时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改革搞好。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

第二点，关于“七五”计划。这次会议通过的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确定的目标是切合实际的，是一个好文件。

“七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定在7%左右，这是政治局常委一致同意的，执行中可能超过。7%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

“七五”这5年很重要。如果经过这5年，使改革基本就绪，经济又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我们实现十二大提出的本世纪末的目标，就有了充分的把握。

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过，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个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份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第三点，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军队都做了不少工

作，特别是群众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影响很好。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这个真理，有些同志已经不那么清楚了。这样，也就很难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

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整党要遵照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决定，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四者缺一不可。党章对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每个党组织应该要求每个党员逐条对照，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必要的时候要采取纪律措施。每个党员都能以身作则，我们的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

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对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流行的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思想问题，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群众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

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同样，对严重犯罪活动的防范和打击，也必须继续加强。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一切企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毫无疑问，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对坚持错误拒绝改正的党员要执行党纪，但是不允许重犯任何简单化、扩大化的“左”的错误。

做好以上几方面的工作，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也就有了保证。

第四点，关于干部的新老交替和理论学习。几年来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进行得比较顺利。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都补充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这次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进退，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这次增选的中央委员，新近上任的部长、省委书记，都比较年轻。一般是50多岁，有的才40出头。我们开国时的好多部长、省委书记，也就是这个年龄。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我曾经说过，不只是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我们常说，干部的新老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

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

现在我还想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这不仅是专对新干部，对老干部也同样适用。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会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我们中国的革命，不就是这样成功的吗？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因此，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85年9月23日

陈 云

同志们：

我赞成中央提出的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建议，赞成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赞成中央常委各位同志的讲话。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干部队伍要保持梯队结构。

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这是近几年来，我们党反复强调的一项重要工作。

经过反复考察，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同志，被选进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

干部队伍保持梯队的结构，可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这件事，我们做的是有成绩的。今后要继续做好。

（二）对于粮食生产，我们还是要抓紧抓好。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生活得到了改善。

农民中从事农副业致富的，有“万元户”，但只是极少数。前一时，报纸上宣传“万元户”，说得太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宣传脱离了实际。

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

最近，国务院批转的吕东同志《关于当前经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讲，农民做工、经商收入多，种粮收入少，就是养猪、种菜，也看不上眼。因为“无工不富”。

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

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了。

（三）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

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

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方向是正确的，具体的步骤措施，正在探索中。要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坚持把改革搞好。

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

当然，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

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指导性计划并不等于市场调节。市场调节,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

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

这次会议通过的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七五”期间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速度,分别为百分之七和六。这个速度比较适宜,执行中可能超过,但主观上不必再提更高指标。

小平同志8月2日接见外宾,谈到我们工农业发展速度太快时说,“听起来可喜,但有不健康因素。”我赞成他的意见。

1984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今年1至7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22.8%。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

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四)抓党风的好转,仍是全党的一件大事。

这些年来,中央抓了党风问题。但是,要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任务还非常重。

现在确有少数党员、党员干部,特别是个别老党员、老干部,不能坚持党性原则,遇到歪风,跟着干。

有些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事,如造假药、假酒等,发生在整党中。

党内外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这些事是极端不满意的,应引起全党认真注意。

整顿党风这件事,不可掉以轻心。

一是各级党组织要重视。二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三是老党员、老干部要重视。包括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在内。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

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

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

(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

最近,书记处讨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课题,我看很必要。我们党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

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甚至违法乱纪。如报上多次公布的,那些投机诈骗,贪污受贿,非法致富,以及在同外国人交往中,不顾国格人格的现象等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

各级党组织都应把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抓好,都要积极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

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才使党始终有战斗力,使革命取得了胜利。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

在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还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and 革命传统教育。

(六)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章规定的原则。

历史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

希望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

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关于制订“七五”计划建议的说明

——1985年9月18日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

赵紫阳

同志们:

我完全同意耀邦同志所作的开幕词。现在,我受党中央委托,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作几点说明。

(一)文件的性质和特征。这个文件是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主持下,经过一年多来反复酝酿、讨论制定出来的。它还不是“七五”计划本身,而是关于如何制

定“七五”计划的建议。它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是:一、“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主要政策措施;三、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实施步骤。这些指导思想、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和改革设想,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提出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十二届三中

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具体化。在起草过程中,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体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建议》中没有列很多数字,只讲了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与方向的一些重要指标。着重研究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是计划工作的一个重大转变,是这个文件的特征。它有利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经济工作的大的矛盾上面,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关键问题。编制“七五”计划和我国以后的中长期计划,都要这样做。这个《建议》经这次代表会议审议通过以后,将由国务院据以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然后提请明年春天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颁布实行。

(二)当前的经济形势。正确估计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拟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依据。对形势的估量,对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的估计,估高了不好,估低了也不好,总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如实估计。《建议》既充分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建议》指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作出这个论断,主要的事实依据是,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经过前几年的努力,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农业生产从缓慢发展走向全面高涨,轻工业生产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走向日益繁荣,能源生产从停滞不前转为持续增长,各项建设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看经济形势,主要看重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看经济能否以适当的速度,持续稳定地发展。这几年总的情况是一年比一年好。在整个“六五”期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有把握达到10%。在编制“七五”计划时,我们对经济发展速度进行多方面测算,看来仍将保持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可达到7%左右,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可以超过7%。在这样长的时期连续保持7.8%乃至10%的增长速度,在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少有的,只有某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才出现过类似情况。这说明我国经济的活力越来越旺盛。现在的情况,与1980年底我们提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解决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的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了。过去我们的经济工作主要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当前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作为中国经济水平发展的重要阶段,今后将开始由温饱型逐步转向小康型,使我国人民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这种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对此,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财政改变了1979、1980两年收入连续下降、存在巨额赤字的情况,近几年在收入大幅度增长、支出显著增加的条件下,保持了收支基本平衡。前两年虽然还有些赤字,但数额较小,今年有可能做到消除赤字。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建设,有少量财政赤字,影响不大,不能以此作为判断财政经济情况是否根本好转的主要依据。今年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预计达到1,700亿元,加上地方、部门和企业拥有的预算外资金,总数将达到3,000

亿元以上,比1980年增长将近一倍。这说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确实增强了。

我们说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基本实现,并不是说已不存在问题和困难了。对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出现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信贷资金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部分物价上涨过多、国家外汇储备下降等问题,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和还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这些问题是能够逐步得到解决的。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认真解决新任务和新问题,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为巩固和发展当前良好的经济形势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形势而努力奋斗。

(三)“七五”时期的任务。概括地说,“七五”期间的任务主要有3条:一、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使改革顺利展开,基本上奠定新的经济体制的基础;二、加强重点建设、技术改造和智力开发,在物质技术条件方面为90年代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准备必要的后续能力;三、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这3条任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当前,更重要的是为下一个10年和下一个世纪的前50年奠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基础。不改革,就没有今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建设服务的,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说,建设的安排要有利于改革的进行。追求过高的建设速度,经济生活各方面都绷得很紧,改革就难以顺利进行。为了给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我们一定不能片面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脱离国力的可能盲目扩大建设规模。但是,也必须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进行必要的骨干项目的建设,加强工农业基础设施,使经济发展有后劲,使人民的实际收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增加。

“七五”期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两年要着重控制社会总需求,解决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在保持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条件下,作一些小的调整,改善投资结构,加强重点建设。这样用两年多的时间逐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比在今年下半年集中解决效果要好些,可以避免由于刹车过急而造成的损失和震动。但分散在两年解决,不易引起大家的重视,搞不好也可能控制不住。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特别加以注意。“七五”后3年,再根据情况,适当增加建设投资。但对建设总规模仍需进行必要的控制,这是多年来的重要历史经验。改革也大体上参照这两个阶段来安排,这样做比较积极稳妥。

(四)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全面改革我国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争取在今后5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建立新的经济体制,要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主要抓好3个方面:一、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

市场体系；三、逐步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建立健全间接控制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 and 调节经济运行。企业活力的增强，商品市场体系的形成，间接控制手段的完善，三者必须互相配套。

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坚决地、有步骤地展开。过去几年，在放开放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进一步完善微观经济活动和机制的同时，从宏观上加强对经济活动的间接控制，也就是说，要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完善经济立法和经济监督。必须认识，从宏观上加强间接控制，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它比之微观搞活、比之直接控制，更为复杂，更为困难，我们也更缺少经验。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与现在已采取的改革措施配起套来，并为进一步搞活企业创造条件，使企业能够对市场变化作出积极反应。在“七五”的前两年，改革的重点要围绕稳定经济的要求，从宏观上加强、完善间接控制体系。除了必须采取的某些价格改革措施以外，应更多地利用利率、税率、汇率等经济杠杆。要抓紧制定一批济经法规，建立和加强经济监督、经济信息系统，加强银行、税收、审计、统计、质量检验、工商管理和社会公证等部门的职能。与此同时，要继续落实和完善国务院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各项规定，特别是要下大力把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中型骨干企业搞活。除了引导企业眼睛向内，挖掘潜力，继续落实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调动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以外，当前还必须注意分别不同情况适当调减它们所负担的调节税，减少局以下公司等中间层次，制止向它们乱摊派、乱集资，减轻它们的负担，以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能使这些骨干企业越搞越困难，而应当使它们越搞越有活力。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七五”后3年，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的要求，进一步加强间接控制，认真搞好生产资料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税制，改革金融体制，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的改革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要按照既定的改革方向，鼓励探索，鼓励创新。这里必须指出，减少直接控制微观经济活动的范围、程度和步骤，应当同国家加强间接控制的能力互相适应，互相配套。

（五）“七五”期间生产建设的两个关键。“七五”期间要为改革创造好的环境，又要为今后的发展准备后续力量，又要改善人民生活，矛盾很多。解决这些矛盾，关键有两条：大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积极增强出口创汇能力。

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高是我国经济的致命弱点，也是今后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开辟国家财源，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改善职工生活，出路就在于把这种巨大的潜力挖掘出来。要紧紧抓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这两个环节，来提高企业素质。我国企业技术落后，管理更落后。“七五”期间应当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但从现实的情况看，改进和加强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具有更大的紧迫性和更加现实的意义。“七五”期间，我们一定要通过改革和工作，加强全面质

量管理，加强劳动纪律，搞好职工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和企业各方面的素质，真正把企业的工作转到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要使全体职工和干部明白，为提高质量、降低消耗而奋斗，就是实现“七五”计划的最好的实际行动。

“七五”期间我们面临着进一步开放的形势。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将不是短期的。我国与国际市场联系的程度如何，决定于自己的创汇能力如何。开放不能只进不出，必须有进有出，进多少取决于出多少，出得多才能进得多。“七五”计划能否实现的又一个关键，是要创造更多的外汇，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要认真研究和制定外贸出口发展战略和系统的政策措施，建立出口生产体系，充分发挥沿海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的作用，带动内地，发展更多的重点出口商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拓国际市场。在增加出口的同时，要努力增加旅游、劳务等非贸易外汇收入。在这个基础上，随着偿还能力的增强，要适当地多利用一些外资，包括优惠贷款和商业贷款，以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我们既要学会创汇的本领，又要学会用汇的本领，使有限的外汇用在刀刃上，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这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提高效益和增加创汇是互相联系的，我们要把立足点放在提高企业的素质上，使我们的企业在国内外竞争中上水平、求发展，使产品经受国内外市场的检验，不断更新换代。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六）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第七个五年计划，应该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进的计划。我们一定要坚决做到：一、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其他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二、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对于一切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必须绳之以法，对于一切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丑恶现象，必须予以制止和取缔；三、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深入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解决思想领域的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以疏导即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能重犯过去“左”的错误。在经济领域中，要大力提倡良好的职业道德，树立企业信誉，实行文明经商，文明办厂，为人民服务，遵纪守法，勤劳致富，抵制各种歪门邪道和腐朽的经营作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坚决贯彻“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充分重视和认真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发展。

同志们！

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做好这5年的工作，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对于更好地保证90年代经济的振兴和繁荣，顺利实现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中央希望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同德，满怀胜利的信心，以改革创新和开拓前进的精神，为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985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

基本指导原则和主要奋斗目标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即将在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进入1986年到1990年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按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总方针,继续做好这5年的工作,必将巩固和发展我国当前大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更好地保证90年代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在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富裕幸福的道路上迈出更为坚实的一步。中央希望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以改革创新和开拓前进的精神,积极投入到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伟大实践中去。

(2) “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条件是很好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引下,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辟了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生机最旺盛的新时期。现在同“六五”计划开始前的1980年相比,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在1980年的时候,我国农业仍然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还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从1981年以来,我国农业以平均每年增长10%的高速度向前发展,各类农副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按照全国人民目前的食物结构和衣着水平,我国粮食已可自给,棉花自给有余。农业的全面高涨,为保障和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在1980年的时候,我国能源生产停滞不前,现在情况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变化。近两三年来,全国原油、原煤产量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达到8%以上,发电量也有相应的增加。能源生产持续增长的新势头,是保障和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条件。

在1980年的时候,我国轻工业生产严重落后于人民生活需要,市场商品匮乏。近5年来,轻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花色品种不断增加,国内市场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繁荣局面。重工业经过调整服务方向,在新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增长,轻重工业的比例趋于协调。

在1980年的时候,国家财政收入继续下降,存在着巨额赤字。从1982年起,财政收入由下降转为持续上升,收支基本平衡。预计1985年国家财政收入将超过1,700亿元,加上地方、部门和企业拥有的预算外资金,总共将达到3,000亿元以上,比1980年增长将近一倍。

在1980年的时候,我国城镇有大量待业人员需要安置,人民生活中积累了许多问题亟待解决。5年来,新就业的城镇劳动力3,000多万人;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增加50%左右,平均工资增加20%以上,农民平均纯收入增加80%。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是建国以来从未有

过的。

总之,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展现了良性循环的前景。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七五”期间的各项改革和生产建设工作做得更加出色,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技术条件还比较落后,农业这个基础还比较脆弱,部分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还相当紧张,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还很不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当前经济工作中还存在着经济效益提高不快、生产技术进步缓慢、经营管理水平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特别是1984年第四季度以来,工业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信贷资金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过多,国家外汇储备下降,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某些新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当前良好的经济形势,又要足够估计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使“七五”计划的制定立足于实事求是的科学基础之上。

(3) 根据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全面分析和科学估量,“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遵循以下的基本指导原则:

——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建设服务的。从当前来说,建设的安排要有利于改革的进行。“七五”期间是全面改革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等管理体制的关键时期。只有不失时机地革除现行体制中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积弊,逐步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各项管理体制,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在今后5年、10年、20年以至更长时期的持续发展。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率,防止盲目攀比和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速度,避免经济生活的紧张和紊乱,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改革的方向必须坚持,改革的步骤必须稳妥。各项改革措施要相互配套,既有利于微观搞活又有利于宏观控制,以保证和促进整个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积累和消费保持恰当的比例。这里的中心问题是根据国力的可能,在妥善安排人民生活的时候,十分注意确定合理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做到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各自平衡和相互间的综合平衡。这是保证经济比例关系协调、经济生活稳定和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的根本条件。鉴于当前的建设规模已经过大,1986、1987两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体维持1985年的水平,后3年再根据情况适当增加。在控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必须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加强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避免不分轻重缓急,防止齐头并进。只有坚持这样做,才能为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必要的后续能力,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

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高,经济效益低,是我国生产建设中长期普遍存在的痼疾,目前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只有坚决改变这种状况,才能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以较少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也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和扩大出口。必须加强质量管理、技术管理,严明劳动纪律、财经纪律,健全检查制度、监督制度,大力提高企业职工素质,同时积极推进技术改造,采用先进的工艺和设备,把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是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途径。

——坚持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切实抓好精神文明的建设,继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以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并保证它的正确方向。

(4) 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为了全面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中央建议“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确定为:争取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大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智力开发,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使199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使城乡居民的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每年递增4~5%,使人民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都有进一步的改善。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工作和各项改革,都要为实现这个主要奋斗目标服务,并据以制定各自的具体奋斗目标。

实现了上述奋斗目标,我国经济实力将有较大增强。到199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将达到16,000亿元,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1,000亿元。在这5年中,我国财政总收入将达到9,000亿元左右,比“六五”期间增加40%以上;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将新增5,000亿元左右,比“六五”期间新增额多60%;随着生产的发展,我国人民的消费将由温饱型逐步向小康型过渡。

(5) 党中央建议的奋斗目标,既是积极的,又是留有余地的。“六五”期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预计可超过10%,已高于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所要求的平均每年增长7.2%的速度。“七五”期间要求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是: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左右,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将目前已经偏高的增长速度逐步降低一些,确定上述这样比较恰当的增长速度,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这将有利于克服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些不稳定因素和顺利推进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有利于把各方面的注意力进一步转到提高产品质量和讲究经济效益上来,从而为全面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宏伟目标奠定更好的基础。

(6) 为了实现“七五”计划的奋斗目标,需要在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和主要方针,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经济体制和调节手段,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符合实际的要求,采取一系列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正确决策。这次制定“七五”计划,除了正确地确定必要的生产建设指标以外,必须充分重视对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使之成为计划的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和主要方针

(7)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七五”期间以至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必须在经济建设的总体布局上认真解决好3个问题:一是,适应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要求,适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二是,坚决把建设重点切实转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三是,正确处理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地区经济布局的合理化。只有在不断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认真解决好这些全局性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综合经济效益,也才能使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得到更可靠的保证。为此,必须认真执行以下6条方针。

(8) 第一条方针是:坚持依靠政策和科学,进一步改善生产条件,继续促进农业的全面稳定发展。农业的发展仍然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必须充分重视它的战略地位。要根据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原则,进一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实现农业经济的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七五”期间,切不可丝毫忽视粮食生产。必须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继续保持粮食的稳定增产。适宜种粮食的地方一定要把粮食种好,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品种,改进质量。在这个前提下,根据市场需求和自然条件生产各类经济作物,同时加快发展林业、畜牧业、水产业和养殖业,提高它们在整个农业中的比重。大中城市郊区要重点发展蔬菜、禽蛋、牛奶等副食品生产,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农村富余劳动力由种植业转入其他行业,因地制宜地兴办农村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采掘业、商业和各类服务业。

(9) 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指导乡镇企业发展的方针应该是: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一般来说,兴办乡镇企业要立足于农业,服务于农业,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农产品的储藏、包装、运输、供销等产前产后服务业。有条件的地方,要在遵守国家规定和保护资源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小型采矿业、小水电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自身的条件,发展为大工业配套和为出口服务的加工工业。各地兴办乡镇企业,应当主要依靠自身的资金积累,量力而行,稳步前进,减少盲目性。所有乡镇企业都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改进生产技术,增进经济效益,并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

(10) 为了更好地振兴农村经济,应当采取以下政策和措施:一、继续完善和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经营方式,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鼓励农民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经营。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农业生产的市场调节范围,进一步放开和调整农副产品价格,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三、实行谁投资、谁经营、谁得益的原则,鼓励农民兴办乡镇企业、农业基础设施和商品储运设施,促进农副土特产商品基地和出口基地的建设。四、加速农业技术改造和农村智力开发,大力推广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促进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五、适当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主要用于兴修水利,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培育、引进优良品种,增加化肥、农药、农用塑料和农业机械的供应,加速植树造林,搞好水土保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六、制止各种不合理的摊派,减轻农民负担。

(11) 第二条方针是:努力扩大消费品工业的生产领域,积极发展民用建筑业。“七五”期间,我国城乡人民消费将趋向多样化,将更加讲究食品的营养和衣着改善,住房、中高档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比重将有较大的提高。适应这种情况,必须在继续抓好日用必需品生产的同时,大力增产名牌产品和优质产品,发展新品种和新产品,开辟新的生产门类。应当把食品工业、服装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作为重点,带动整个消费品工业生产的更好发展。

(12) 为了加快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应当继续在贷款、外汇使用、能源和原材料供应、运输条件等方面给予优先保证。要有步骤地拉开名牌产品、优质产品、新式产品同一般产品的质量差价,以促进品种的增加、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